西方学者有关天地会研究述略

〔美〕穆黛安　　秦宝琦

中国清代历史上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不仅受到中国历史学家们的重视，而且很早就引起了西方研究者的兴趣。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不少西方人开始对天地会进行研究。当时在东南亚一带，特别是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当时的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华侨中，有着强大的秘密团体天地会。其势力和影响所及，甚至超过了当时荷兰、英国与法国的殖民政府，所以天地会的组织引起了两部分人的关注：一是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地政府的官员，他们迫切希望了解天地会的内幕而便于治理；一是一些西方社会学学者，他们鉴于天地会的情况，同西方国家的共济会（Free Mason）有许多接近或相似之处，所以对天地会十分感兴趣。

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途径，一是派人参加到天地会内部去探明天地会的组织、仪式、联络暗号及首领；一是通过天地会内部的秘密文件或被捕者的供词，以了解天地会的历史，并且把它同共济会作比较研究。这些西方殖民政府的官员或社会学家，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天地会的论著。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继续对天地会的内部情况及活动进行研究，出版了更多的论著。下面仅就我们所见到的，作简要介绍。

一、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人的研究

在西方人中，最早注意到天地会并进行研究的，是英国人米勒博士（Dr.Milne）。他是马六甲（Malacca）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院长，1821年，他写了一篇有关马六甲华人中天地会情况的论文：《一个名为三合会的中国秘密结社》（Some Account of a Secret Association in China Entitled the Triad Society），发表在1826年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卷一。作者指出，这个秘密团体在中国本土，嘉庆初年称为“天地会”。嘉庆八年因受到清政府的镇压，改名“三合会”（Triad）。它的宗旨最初只是为了互相帮助，可是，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变坏，它进行械斗、抢劫，反对政府并谋求政治方面的权力。若遇政府搜捕，则共同拒捕，互相包庇。此外，它还进行其它非法活动。

作者把天地会同西方的共济会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源远流长，目的都是为了互相帮助；结会仪式与誓言比较接近；各有三名为首之人。

英国人纽博（Lieutenant Newbold）于1841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1841年卷六）发表论文《中国秘密社会——天地会》（The Chinese Secret Society of Tien-Ti—Huih）。文中提出天地会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演义描述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他利用南洋一带报刊上的资料，指出在南洋的天地会组织中，有福建与广东两大支，二者之间互无联系。文中介绍了南洋天地会的活动如械斗、抢劫及其结拜仪式、组织状况、首领及誓

词等内容，并把天地会的《三十六誓》译成英文。作者认为天地会与共济会在结会仪式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天地会是个政治性组织，与德国的秘密社会——兄弟会比较接近。

1846年，被人称作“一手拿《圣经》，一手拿鸦片”的传教士兼烟贩古斯塔夫（Charles Gutztaff）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八卷上发表论文：《中国的秘密结社——三合会》(On the Secret Triad Society of China, Chieflyfrom Papers found at Hong Kong）。作者把许多在中国发现的天地会资料译成英文。他认为天地会成员主要是下层社会的人，如商人、差役、妓院老板、赌徒等，也有少数地位较高的人参加。他们参加天地会，皆出于政治目的，即为了“反清复明”。古斯塔夫的资料中，包括《西鲁传说》的译文。

1849年，霍夫曼（Hoffman）又名斯威尔斯·威廉（S·Welles Williams）在《中国大全》（Chinese Respository)1849年6月号上，发表《三合会的誓辞及其源流注释》一文,(Oathes Taken by Members of the Triad Society, and Notices of Origin）。他撰写此文时，利用从朋友处得来的一些有关天地会的手稿、小册子及纸旗等，在所附文件中，也有一篇《西鲁传说》的译文，同时还有《三十六誓》的译文，不过内容与纽博所译的那件稍有不同。

1863年，荷兰殖民当局的警方，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巴东地方一家华侨家中，搜到一批天地会秘密文件，内容包括会内传说、誓词、歌诀、图象等，这批资料被交给在当地殖民政府中供职的汉文翻译官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去翻译。施列格利用这些资料并参考其它资料，写成《天地会》（Thien Ti Hwui,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and Earth League)一书。作者指出，天地会结会时举行的歃血结盟这种仪式，在中国由来已久，甚至在周朝即已存在。但当时这种仪式要由政府官员主持，禁止私人结盟。在三国时期，一个结拜弟兄的典型例子，是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的“桃园三结义”，而天地会的起源，则可能同中国的宗族制度有关，但也受到过佛教的影响。不过，在清朝建立前，天地会尚未作为政治组织而出现，到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占据台湾岛以后，天地会才变得有名了。作者把荷兰警方查获的天地会秘密文件中的西鲁传说，全部译成英文，作为天地会的历史，写入书中的第一章。

在施列格《天地会》一书问世后，英国人也加紧了对南洋一带天地会的研究。1876年毕麒麟（W·A·Pickering）在英国海峡殖民地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学报》1878年卷一上，发表论文《中国秘密社会及其起源》(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s）。作者为了了解天地会的内幕，曾亲自参加了当地的天地会组织，（该组织当时在当地是合法的）。他曾同会内最高首领交谈，并得到两本天地会的秘密文件《会簿》。他根据《会簿》中的西鲁传说，认为天地会始于康熙十三年（1674）。他在文章中提到，他准备写一篇文章，叙述康熙十三年天地会创立直到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认为天地会最初创立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后来才变成为打架斗殴、械斗、抢劫、骗钱、赌博及利用娼妓赚钱的组织。

作者断言天地会乃是共济会的一个分支，宗旨是为了传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因受到清政府的压迫，而不断进行反政府的活动。他希望天地会能够消除所有的政治因素与

犯罪因素，成为一个好的组织，为当地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做出贡献。

二十世纪以来，英国人继续对天地会进行研究。1900年，英国人斯丹顿（Wiliam Stanton）在香港、新加坡同时出版了《三合会或天地会》（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一书。斯丹顿曾为香港警方工作，对当地三合会的内情，多有了解。他认为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秘密社会，但都没有像中国的秘密结社那么多。他不仅考察了天地会，还考察了白莲教和八卦教。他不同意有些西方人关由天地会就是白莲教的看法，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天地会的创立，可能同吴三桂的反清起义有关。因为吴三桂背叛了明朝，所以在天地会的文件中，从来不提吴三桂。又认为天地会的创立者，同和尚大概不无关系，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洪武）便是个和尚。

天地会最早的起义是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到1832年，天地会已经从台湾传到了湖南、两广、江西等省。书中还简要地叙述了1849年陈庆真创立的闽南小刀会、1854年广东佛山天地会起义等。书中叙述了"西鲁传说"的内容，并认为天地会的目标是"反清复明"。他是第一位西方学者把天地会的三十六誓连同中文原文介绍西方读者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国的旅行家、记者、传教士们，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秘密结会的考察报告，最著名的有美国的《中国记录者》（The Chinese Recorder），其中记载了河南红枪会和哥老会的情况。

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受到中国学者重视研究农民战争的影响，也对中国下层社会的活动，发生了兴趣。一些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研究中国的海盗与秘密结社，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

历史学家赖伊发（Laii—yi—faa）在1950年所写博士论文《海盗参加两广太平军起义》（The Part Played by the Pirates of Kwangtung and Kwangsi Provinces n the Taiping Insurrection），实际上是一本有关天地会的书，主要依据地方志和奏折。他研究了三合会同两广海盗的关系，以及天地会的社会功能。

人类学家斯其纳（G·William Skinner）也对中国秘密社会进行研究。他的论文题为《中国农村的市圩与社会结构》(Market Town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China),（1964）他认为市圩在中国秘密社会中，有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市场有不同的层次，有与农村关系密切的初级市场，也有与小县城有关的中级市场及与大城市有关的较大市场。而秘密社会则主要同初级市场有关。如哥老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便皆在农村市圩。

1958年，人类学家福利丹（Maurice Freedman）在《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一书中说：虽然天地会中有一些官员与绅士参加，但其成员中更多的则是农民和其它下层人民。天地会往往同宗族组织争夺对农村市圩的控制权而互相争斗。

六十到七十年代，法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分析方法，认为研究历史应该主要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这个学派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有代表性者有：霍布斯堡（Eric J·Hobsbawm）所著：《原始的叛乱：十九与二十世纪原

始形式社会活动的研究》(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 th and 20 th Centuries),和 沃尔夫(EricWolf)的论文《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Peasant Wars of the 20 th Century)(1969年)。

六十年代，在几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学者们的论著，都曾涉及对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如1964与65年巴黎国际学术讨论会；1965年7月在英国里兹举行的第十七次国际汉学家代表大会和1967年在美国密西根举行的国际亚洲学代表会议。在此之后，在1971到1972年，出版了三本有关中国秘密社会的书。第一本是一篇博士论文，作者是大卫(Feiling Davis)，书名是《中国原始形式的革命》(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of China)，1971年在伦敦出版。作者研究了中国秘密社会的起源、宗旨和活动，以及秘密社会如何吸收新的成员、秘密社会的组织与构成等问题。该书的主要缺点，是方法比较陈旧，而且常用"捻"和其它秘密社会的史料，来说明天地会的情况。该书的另一缺点，是很少使用中文资料，主要利用施列格、莫根等人的第二手资料。他认为中国的大多数会党皆来源于三合会，而三合会又来源于白莲教。其主要目标在于使中国从满族统治下得到光复。所以，中国的秘密社会虽然不是革命，但它乃是从自发反抗到革命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可以说是原始形式的革命。

第二本书是法国人切斯那赫(Jean Chesneaux)所著《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的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in Chin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1971年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该书也很少使用中文资料。作者提出，天地会的"西鲁传说"并非历史事实，所以认为三合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是没有根据的。书中还介绍了天地会以外的几个小的秘密结社，并论述了天地会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还认为秘密社会在鸦片战争中，是中国人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最好组织。在辛亥革命中，同盟会曾与秘密社会紧密合作。1919年到1949年，秘密社会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城市中，工会承担了以往秘密社会的任务，因而秘密社会便转而去从事非法活动。在农村中，秘密社会则帮助中国共产党革命，在三十年代曾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作者认为中国的秘密社会同西方的共济会之间并无关系。

1972年美国施坦福大学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秘密社会的论文集《人民运动与秘密社会在中国，1840—1950》，(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该论文集由切斯那赫主编。书中包括以下几篇论文：

第一篇：法国人切斯那赫的《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s Historical Evolution)文章论述了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秘密社会的活动，除天地会外，还涉及哥老会、红枪会等。这些秘密社会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反对政府的；其活动代表了小资产阶级；都是地方性的，而且旋起旋灭，未能持久。这些秘密结社的性质，一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二是反映了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作者把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组织，都视为秘密社会。

第二篇是魏克曼(Ferderic Wakeman, Jr·)写的《广东的秘密社会1800—1856》(The Secret Societiesof Kwangtung, 1800—1856)。作者利用了英国伦敦公共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 (F·O)〕中的中文档案及地方志，和日本人著作中的第二手材料。作者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在台湾创立的，后来传到福建，再由福建传到广东。他们以"反清复明"为口号，不过，"反清复明"对他们来说，无非是一场黄粱美梦

而已。作者还探讨了鸦片战争时期、广东红兵起义时期绅士同天地会间的相互斗争。他认为天地会的成员，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无业游民。最后，作者还论述了孙中山的“反满”问题。他认为孙中山的“反满”与天地会不同。天地会反满是为了复明，使他们重新生活在儒家制度之下。而孙中山反满，则是要创立新的共和国。所以，天地会的失败，不是新式革命的失败，而是传统叛乱最后的失败。

第三篇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诺维科夫（Boris Novikov）的论文：《三合会的反满宣传，1800—1856》（The Anti—Manch Propaganda of the Triads, 1800—1860）。作者认为在天地会的活动中，重要的不是天地会领导的起义，而是它的反满宣传。为此，他探讨了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内涵。他认为天地会反满（即反清）的原因有三，一是清政府焚毁了少林寺，因此要进行报复；二是因为清政府压迫老百姓，所以要把它推翻；三是因为满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反满”乃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口号。天地会为什么要“复明”呢？其中有人要恢复明朝的统治，有人要恢复汉人的统治，有人则要求恢复一个好皇帝的时代，而非真正的明朝。

第四篇是伦敦亚非研究中心（属伦敦大学）的柯温（C·A·Curwen）所写的《太平天国同秘密社会及其它叛乱的关系》，（Taiping Relations With Secret Societies and With Other Rebels）。作者指出，太平天国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待秘密社会的政策和态度有所不同。在其实力较强的阶段，它认为秘密社会是个落后的组织，不愿与之合作。太平天国向秘密社会宣布：如果要同我们合作，必须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加以改变，不得使用原来的名称和口号。可是后来太平天国逐渐衰落了，因而也需要同其它组织合作，于是也同意秘密社会使用自己的旗帜口号进行活动。文中提到天地会的首领洪大全，是洪秀全的结义弟兄，原名焦亮，是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作者表示不理解洪大全为什么要使用“天德”这个称号。

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十九世纪的中国地方上的动乱。他们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低于“县”一级的“大众运动”观点来研究的。也就是说，不同身份、阶级、层次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造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这部论文集中的反映，便是温斯顿·谢所写的《三合会、盐枭和地方起义：辛亥革命前广东惠州革命的经济背景》）Winston Hsieh：“Triad, Salt Sumugglers, and Local Uprisings: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Waichow Revolution of 1911”）他运用美国学者施其纳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来研究天地会在广东惠州的革命。指出天地会的活动，最初是由在初级市场（农村市圩），其后发展到中级市场（县城附近的市场），最后发展到大城市附近的市场。惠州的天地会和盐枭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政府对市圩征收的赋税太高了，因而进行反抗。可见惠州起义带有反抗清政府的性质，是由天地会（三合会）所领导的。惠州起义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其它起义的模式，当时许多起义是从大城市到乡村，而惠州起义则是从农村到城市。作者还探讨了天地会与盐枭的发动模式，如何动员群众起来革命。

197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孔飞力（Pnilip Kuhn）的新作：《叛乱势力及其敌对集团的地位：晚清中国的动员和社会结构（1796—1864）。（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zation and Social Structnre, 1796—1864）。作者探

（下转第62页）

亡的社会背景，汉人、满人在有关律令上的意见对立，以及督捕则例作为处理这一问题的专门法令逐步得到建立完善的经过。论文的突出贡献是第一次搞清了历来被当作顺治律的令文实际是康熙律。中村茂夫《亲属容隐考》(《东洋史研究》47—4)将清律中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同唐律进行比较，认为这是儒家亲亲主义在国家之法中的体现，堪称儒家思想渗透入法的典型事例，其对日本刑法亦有相当影响。目黑克彦《关于鸦片战争前国内禁种罂粟政策》(《研究报告》〈爱知教大〉社会科学38)讨论了清政府针对国内种植罂粟，制作鸦片，利用保甲制为防范手段的有关政策。

叛乱、民族问题。山田贤《嘉庆白莲教叛乱的思想》(《史潮》新26)剖析指导嘉庆白莲教叛乱的教派教义及集团宗教仪式，指出其中反映出企求救济的宗教世界观，认为白莲教系民间宗教与移民社会蓄积已久的不安定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叛乱的发生,是试图再现叛乱民众内心世界的优秀之作。石桥崇雄《〈御制清文鉴〉考》(《纪要》〈国士馆大、文、人文学会〉别册1)考证康熙年间纂成的书名辞典的出处依据，强调建立清王朝的满洲贵族在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上曾煞费苦心。另外作者完成了满汉对译辞书《清文备考》中《户部成语》部分的索引编制工作。河内良弘《崇德二年正月满文档案译注》(《研究纪要》〈京大、文728〉则是中国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的日文译注。

(上接第58页)

讨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两大势力集团，即正统和异端。他认为正统势力集团有三个层次 即乡村组织、团练和湘军、淮军等武装集团；异端组织也有三个层次，即贼伙、堂和会社。这两大势力集团也互相转化，秘密社会有时也参加团练或被招抚，湘军、淮军中也有人参加秘密社会。

香港中文大学的福尔(David Faure)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秘密社会、邪教和农民起义》(Secret Societies, Heretic Sects, and Peasant Rebellion in 19thceatury China)一文，提出一个新看法，认为秘密社会和邪教的思想并不带有反叛性。以往清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天地会有一套自己组织的系统，实际上天地会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秘密社会和宗族组织是平行的，都没有反叛思想，而是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

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加州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中心内容是：《晚清中国的正统和异端：文化、信仰和社会分化》(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ultural Beliefs and Social Divisions.)。大卫·福尔(David Faure)在《十九世纪的天地会》，(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一文中，认为天地会及其分支，都有反清复明的传说；天地会的成员，其宗旨并非为了反对政府；《西鲁传说》可能是由好几个故事组合而成的；天地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分散后彼此即无联系。每个天地会的组织都是独立的。天地会虽然同许多非法活动有关，但并不是要推翻政府，其结会方法，颇受宗教之影响。